

恩施州
民族研究
丛书

景阳社区文化

谢亚萍 雷翔 编著

《明史》列傳

州：施南宣撫司、散毛宣撫司、忠建宣

州：隨為清江郡，改施州。明初仍之。洪武

使司，屬湖廣都司。領軍民千戶所一：曰金坪，戶

曰高羅。領長官司七：曰搖把峒，曰上愛茶峒，曰下愛茶峒

曰木冊，曰鎮南，曰唐崖。領蠻夷長官司五：曰鎮遠，

曰東流，曰臘壁峒。又有容美宣撫司者，亦在境內，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景阳社区文化

谢娅萍 雷 翔 编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阳社区文化/谢亚萍 雷翔编著.

(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

ISBN 7-216-04534-3

I. 景…

II. ①谢…②雷…

III. 乡村—文化—研究—建始县

IV. J12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114 号

景阳社区文化

谢亚萍 雷翔 编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恩施日报社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

版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5 千字

全书总定价:360.00 元

书号:ISBN 7-216-04534-3/J·10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冠序）

周先旺

自2000年以来，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认真贯彻落实《恩施自治州2000—2010年民族文化研究大纲》，连续出版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推出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基础性成果，为建设民族文化大州作了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在州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化贡献。

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是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它是根据我们面临的快速发展的经济时代，经济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特征而提出来的。就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而言，已经没有孤立的经济形态和孤立的文化形态，二者逐步相互渗透而趋于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民族文化大州，就是要把民族文化作为新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植，即充分利用我州独特的又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资源，挖掘、开发、创新、整合，形成我州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产品、产品文化，形成一种新的特色产业，进而不断提高民族文化对我州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恩施州是一个民族自治地方，位于祖国腹地，地处我国中西部结合部和中原汉族地区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延伸地带，既是古代巴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又是中原汉族文化和西南

少数民族文化的融汇地。多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尽管恩施州的地域文化深受汉文化之影响,但少数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并在充分吸收汉文化营养的基础上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对恩施州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恩施州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创造、积淀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无论与汉族地区相比,还是与周边的武陵地区相比,都很具代表性。这是我们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资源优势。从开发的角度讲,我们还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大州,还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名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恩施州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一种文化发展优势。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首先就面临一个保护与传承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民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创新,加之现代文明的冲击,有些品种面临着消沉和濒于消失的危险境地。如果不下决心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继续抢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珍品就有可能消失于我们不经意的转眼之间。恩施州民宗委的有识之士,站在一种文化的高度,以极大的魄力率先领军占领了这块文化高地,体现出他们的远见卓识、文化追求和民族责任心。

近七年来,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恩施州2000—2010年民族文化研究工作大纲》,筛选课题,组织攻关,连续组织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开创了全州民族研究的新格局,这是全州民族工作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迄今为止,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已经组织出版了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以平均不到两年组织出版一套丛书的速度将全州民族研究工作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为我们全州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作树立了一座丰碑。它的意义在于:联系与团结了有志于民族文化事业的民族文化人聚集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

旗帜下；有效地抢救了我州民族文化的许多重要品种，为我州的发展尤其是建设民族文化大州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深入开展文化抢救保护工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在组织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的过程中，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工作方法和文化理念。他们提出的“网络人才、组织课题、支持研究”的工作方法，成为恩施州民族研究工作可供借鉴的模式。他们提出“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生命”的文化理念，科学地处理好创新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通过出版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州民宗委和州民族研究学会积聚了一大批民族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为推进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套“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中，大部分属于州内文化工作者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并以民族民间艺术类、民族遗迹类和民族史志类为主要内容。组织出版“恩施州民族研究丛书”，不仅使恩施州的文化工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与理性研究成果得以贡献给社会，还为传承后世并创新发展打下了基础，促进我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整理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州的民族文化宝库，而且为专家、学者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研究成果，为推进全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2月28日

注：周先旺系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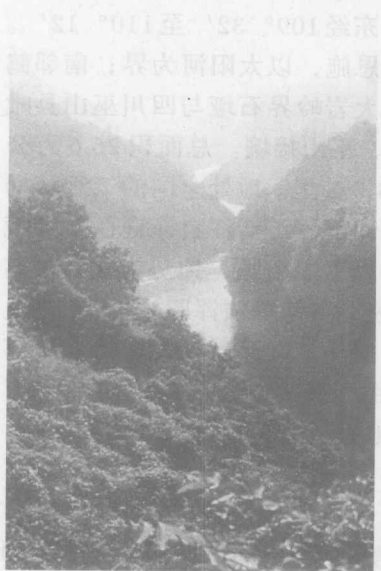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清江流域的远古文化	(1)
第一节 汉代至解放初期建始及景阳沿革	(2)
第二节 战国至秦汉时期出土的巴式青铜器	(5)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巴人“廩君”遗存	(10)
第四节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活动情况	(21)
第二章 景阳社区的形成及演变	(26)
第一节 社区的自然人文环境	(27)
第二节 社区的形成	(33)
第三节 社区演变与改土归流	(40)
第三章 意境幽远的地名传说	(44)
第一节 景阳关及其传说	(45)
第二节 兴隆寺及其传说	(62)
附录：其他风物传说	(77)

第四章 独具特色的习俗传说	(89)
第一节 赶毛狗传说、习俗及其仪式	(90)
第二节 建始赶毛狗与恩施赶毛狗之比较	(95)
第三节 赶毛狗的社会文化功能	(99)
第五章 智趣横溢的民间故事	(104)
第一节 景阳民间故事类型	(105)
第二节 机智人物故事及类型	(129)
第三节 民间故事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征	(138)
第六章 类型特殊的民间歌谣	(146)
第一节 景阳民间歌谣的类型	(147)
第二节 怨情歌——《十想》	(162)
第三节 苦情歌——《十月相思》	(168)
第四节 偷情歌——《思相》	(174)
第七章 景阳民间文学的俗变与流变	(186)
第一节 生存与民间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187)
第二节 民间文学的变异、传承与整合	(192)
第三节 民间文学的现代性	(200)
第八章 现代化背景下的景阳社区文化变迁	(205)
第一节 经济生活的变迁	(206)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迁	(210)
第三节 学校教育的变迁	(215)
第四节 语言文化的变迁	(221)
第五节 宗教信仰的变迁	(228)

第九章 建立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	(237)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环境转移	(238)
第二节 生态资源的经济开发价值	(244)
第三节 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发展选择	(256)
后 记	谢娅萍 (268)
抢救保护与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时不我待 (跋)	田发刚 (270)

第一章 清江流域的远古文化

湖北省山南西鄂于归县城步，县城对景阳河非清江支流



景阳河谷 陈湘峰/摄

清江，古称夷水，又称盐水，全长425公里，因河水清冽而得名。景阳，则地处清江的中游，自古以来便是施宜古道上极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这一区域，素来被称为“神奇的土地”，蕴藏着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故事及其歌谣。景阳，从远古走来，不仅被视为早期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而且作为巴人“廩君”活动和迁徙的重要地区；景阳，朝未来走去，像许许多多这样的少数民族社区一样，经历着现代化的冲击和洗礼，

其民族文化既源远流长，古韵盎然，又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和自然变迁。

第一节 汉代至解放初期建始 及景阳沿革

景阳隶属湖北恩施州建始县，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地跨北纬 $30^{\circ}06'$ 至 $30^{\circ}54'$ ，东经 $109^{\circ}32'$ 至 $110^{\circ}12'$ 。东连巴东，以野山河为界；西接恩施，以太平河为界；南邻鹤峰，以长河、茶寮河为界；北至大岩岭界石垭与四川巫山县毗连，西北至三县桩，与四川奉节、巫山接壤。总面积26.6万公顷，南北长89公里，东西最宽64.5公里。地处全国的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属云贵高原东北部延伸部分。清江自东向西横穿境内，清江以南属武陵山脉，以北属巫山山脉，地势南北两部高耸，逐步向西南和中部减缓。地貌特点是峰顶浑圆，冲槽、高丘纵横交错，岩溶地貌发育强烈，漏斗、石芽、峰林、溶洞、盲谷、伏流、岩溶洼地到处可见。由于形成古老（约1亿~3千万年前），经受地壳运动次数多，地壳断陷和抬升显著。

一、建始县建制沿革

建始县古属巴子国地；三国吴景帝孙休永安三年（公元260年7月）置县，隶属荆州；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5年）省后复置，属建平郡，仍隶属荆州；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改置业州，治所设今三里区槐坝乡棉花坝；隋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废州设县，属清江郡，义宁二年，即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复置业州；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再废州，以县属施州；宋，属夔州路总管府。北宋将治所从棉花坝迁至今业州

镇；元，仍属夔州路；大夏（公元1361~1371年），明玉珍及子明升以四川为主，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夏，建始随属；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属湖广都司施州卫。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拨卫入楚，县属夔州府；清初，县属夔州府。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县属施南府，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未变。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废府存县，直属湖北省。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贺龙领导工农红军在官店口建立革命根据地政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辖六区32个乡苏维埃政府，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并存；同年秋，工农红军转移，官店口等革命根据地重新沦为国民党统治。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属湖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直至1949年11月4日建始全境解放。从1949年11月5日至1983年11月31日，属湖北省恩施专区管辖。1983年12月1日起属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至今。

二、景阳所属行政区划

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编户7里：即坊廊、太安、长寿、景阳、新塋、永福、革塘；丁酉年（公元1837年），并景阳、新塋、永福、革塘4里于方廊里、太安、长寿里，实有3里，分4甲，共乡保约350个；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县设4乡，以县城东南西北方位定名，即东乡、南乡、西乡、北乡。户编3里，即方廊里、太安里、长寿里。

民国元至六年（公元1912~1917年），沿袭清宣统时期政区；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县设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10个区，其中景阳、官店、硝洞、竹园等地属信字区管辖；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县设长梁、三里、花坪3区，区下辖联保36个，保327个，甲3143个。景阳属花

坪区管辖；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改区设署：一区署驻长梁子，二区署驻三里坝，三区署驻花果坪；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行政机构改组，将联保改为22个乡，撤三里、茅田两区，保留花坪1个区，景阳仍属花坪区管辖；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设花坪、茅田2区，共22个乡，其中花坪区辖属景阳、唐坪、石马、官店、红岩等9个乡；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撤区仍设22个乡，乡以下设211保，3321甲；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县设城乡、茅田、三里、花坪、官店5区，共22乡，218保，3370甲，直到同年11月5日建始解放。

1949年11月6日，建始县人民政府成立，设城乡、茅田、三里、花坪、官店5区；1950年5月，增设高坪、长梁、天生（后称铜鼓）3区，共8区，原保改为218个行政村；1951年5月，又增设当阳、红石2区，全县共10区，经过减租反霸，改选建立基层政权，并村建乡，共设183个乡；1952年8月，增设景阳区，撤当阳区，全县实设城乡、长梁、天生、茅田、三里、高坪、红石、花坪、景阳、官店10区；1958年9月，撤销区乡建制，建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设朝阳、猫坪、桂花、新建、高龙、和平、花坪、官店8个大公社；1961年，恢复区，设9区，120个乡级人民公社；1975年3月，撤区并社，全县设猫坪、天生、龙坪、茅田、青花、景阳、官店、长梁等24个区级公社，401个大队；1984年8月，全县设猫坪、长梁、茅田、龙坪、高坪、三里、花坪、景阳、官店9个区，其中，景阳区内辖青龙、楠木、革坦、景阳、凤凰、硝洞、挖葛、高燎、尹家、大里10个乡，共33个村民委员会，268个村民小组。^①

^①参见建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始县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节 战国至秦汉时期出土的 巴式青铜器

1977年3月的一天，清江南侧的景阳区革坦坝二台子，有一位农民在50厘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一尊双虎钮罍于，伴随出土的还有铜壶1件。双虎钮罍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同出的铜壶重2.5公斤，高32厘米，长颈上大下小，中部突起，腹部两侧有铜环（已缺失），鼓腹处刻有筛线环纹，为典型的汉代酒器或量器。双虎钮罍于如今已被移至恩施州民族博物馆，被珍视为镇馆之宝。这一文物的出土，昭示着战国时期，景阳清江流域曾是巴人定居、繁衍生息之地。

翻开土家族历史画卷，可见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罍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一、清江流域出土的巴式青铜器

建国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

铜器 50 余件，总的情况如下：

利川境内的凉雾、建南、忠路、谋道等地共出土虎钮鐔于 3 件，铜釜 1 件，编钟 2 件。其中，利川忠路出土的虎钮鐔于，平盘内刻有人头面、鱼纹、船纹等。

恩施境内的屯堡、三岔、白果、新塘、崔坝、大集、白杨坪、旗峰坝等地共出土虎钮鐔于 4 件，编钟 5 件，铜釜 2 件，铜钲、铜洗、铜壶、铜簋等各 1 件。

宣恩境内的焦园 1990 年出土虎钮鐔于 1 件。

建始境内的景阳、猫坪、长梁、望坪、三里、茅田等地共出土虎钮鐔于 4 件（其中有 1 件双虎钮鐔于，1 件桥形钮鐔于），编钟 5 件，铜钲 2 件，铜壶、铜矛、铜钺各 1 件。

鹤峰境内的城关鸡公洞等地共出土虎钮鐔于 2 件。

巴东的清太坪、野三河、大支坪等地共出土虎钮鐔于 4 件，编钟 6 件，均出自大支坪连三坡一洞穴内，这是鄂西南区域首次发现多枚编钟同出。

长阳的榔坪、鸭子口、贺家坪等地共出土虎钮鐔于 2 件，编钟 1 件，铜戈 1 件。

在上述出土的巴式青铜器中，以虎钮鐔于最多，共 20 件，而整个湘鄂渝黔毗邻区域出土的虎钮鐔于仅见于资料报道的就多达 75 件，此外，历史文献中记载出土的虎钮鐔于也达数十件之多，如《湖北通志》记载：“清嘉庆甲子，施南人又在土中掘出大小虎鐔，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在这些出土的虎钮鐔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鐔于。

二、虎钮鐔于的源流及特点

鐔于为乐器，由鐔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鐔和鼓。”郑《注》：“鐔，鐔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

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鐃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鐃于的形制，铜制鐃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鐃于必然是由陶鐃→素鐃→钮鐃→虎鐃，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①据考证，鐃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②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时代最早的鐃出于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春秋时代的鐃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鐃于、丁宁（丁宁，钲也），傲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鐃于，并用于战阵。

鐃于传入清江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巴人从东夷人那里继承和袭用了鐃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鐃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鐃于之上，使之成为巴民族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鐃于主要分布于湘、鄂、渝、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③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鐃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鐃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鐃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鐃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鐃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鐃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鐃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

①徐中舒：《巴蜀文化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②朱世学：《虎钮鐃于的源流、特点及功能》，《土家族研究》2001年2期。

③邓辉：《虎钮鐃于用途初探》，《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

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鐔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

三、虎钮鐔于的功能

通观虎钮鐔于，它首先是乐器功能，同时又是村寨、氏族部落军事行动的号令之器，此外它还是娱乐、祭祀、祈祷、庆典等礼仪活动中的重要祭器。但多年来，从事巴文化研究的部分学者，片面强调虎钮鐔于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将虎钮鐔于视为巴民族虎图腾崇拜的标志，有的甚至将其视作巴国之重器，或王器，显然有悖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首先从数量上看，在湘、鄂、渝、黔毗邻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出土虎钮鐔于达百余件之多，加上解放以前出土的和尚未出土的，其数量至少在数百件以上，巴人当时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部落之王。其次，虎钮鐔于多窖藏单件出土，数件共存的较少，在考古发现的巴人遗址和墓葬中更是极少发现，且窖藏出土的地点多为山洞、河边或树下，其地理环境绝不像是王者所居之处。因此，说它是王器或重器，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前已论及，鐔于源于中原，最早出自春秋齐鲁之间，流入南方后也非巴人所独擅，考古所见除巴地外，尚有湖南、四川、贵州等苗、蜀先民活动地域使用鐔于，且鐔于之钮虽以虎居多，但间有马钮、桥钮、凤钮和素钮等，仅在鄂西南地区出土的鐔于中，除虎钮外，尚有马钮、桥钮。可见，虎钮并非鐔于之特征。

按考古分期，鐔于必然是由陶鐔→素鐔→钮鐔→虎鐔演变而成，鐔于盘上的虎若真是巴人的图腾，那么原始形态的陶、素鐔上则更应该有虎钮或虎纹，因为图腾崇拜的原则是氏族愈原始，图腾影响愈深，巴人要表现其图腾崇拜只能在夏、商时期的陶器文化中，进入青铜文明之后，这种崇拜理当逐渐消失。而实